



# 白肤色中国官员

作者：丹·谢尔曼

译者：李锦生 杨声明 袁采凤 贾秀海

张伟 校译

Dan Sherman  
The White Mandarin  
Panther Granada  
Publishing Ltd 1984年版译出

## 白肤色中国官员

---

作者：〔美〕丹·谢尔曼

校译：张伟

责任编辑：朱卫国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保定市满城科技印刷厂

经销：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92千字

印张：13

版次：1989年7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7—5063—0277—2/1·276

定价：4.95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内 容 提 要

约翰·波利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中国大陆解放前夕受命潜入上海，因他爱上了国民党要员冯麟之弟冯麟的情妇（一个高级妓女），遂与麟发生冲突并杀死了麟，其后，波利逃到北京，利用国共矛盾在共产党最高层要人的过问下，几经周折得以与相爱的中国女人重逢结婚生了一个女儿。中国解放后，他在宣传部任职并为报界撰写文章，“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得到了周恩来等许多中国领导人的保护和关怀。70年代初，中央情报局派人再次同波利接上了头，波利接受了离间中苏关系，缓解中美关系的任务，为此进行着秘密活动。……

全书以波利女儿被绑架案为线索，细致、生动地展现了波利在中国22年的间谍生活。书中既有缠绵的情爱，又有扣人心弦的搏杀，尤为难得的是该书揭露了当时林和毛之间，中、美、苏及国民党之间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内幕，书中秘闻广泛涉及当今政府中的众多高级官员，读起来扣人心弦，发人深省。

DE 38/4

译者：李锦生 杨声明 袁采凤 贾秀海

校译：张伟

作者：丹·谢尔曼

Dan Sherman.

The White Mandarin

根据美国 Panther Granada Publishing  
Ltd, 1984 版译出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万物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故

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微。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摘自老子《道德经》

**谨以此书献给**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  
众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作出贡献的北  
京官员。

## 序 言

多年来，连自负的美国情报界也不得不承认，在世界冷战场中，没有任何地区比亚洲更令人难以捉摸。在那里，冲突的形态不断变幻，冲突的焦点也飘忽不定。象他们古老而神秘的历史，猜度他们，会宛如置身于烟笼雾绕的云端，茫然不知所措。

自从亚洲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几件大事以来，美国情报部门尝试着将其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以求得一个清晰的线索。兰利历史处<sup>①</sup>一九七五年编写的关于中国战争的系列材料系其中的一部分。这组由莱尔·塞沃森主编的材料第一次对飞越台湾、媾和计划、东南地区秘密行动等事件做了详尽的分析。一年之后，他们又完成了一组补充材料。然而，即便如此，人们对中国勇士的情况仍然所知甚微。

这些关于亚洲冷战的记实材料，只能记载些旁枝蔓节，毫无绪端；谍报员在缅甸北部山中几番游历后失踪；情报官

---

<sup>①</sup> 兰利(Langley)：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

员们渗透于神秘的香港社会；大批应募受训的特务在当地胡作非为；伪造文件事件层出不穷；经费去向不明；没有线索的七起凶杀案件等等。阅后给人留下如坠雾中的感觉。

一九八〇年春，历史处再次受命对另一场亚洲冷战进行调查记录并材料整编工作，但结果仍然令人失望。在材料中找不到清晰完整的线索，许多明显的疑点也未得到澄清。绝望中历史处的专家们向亚洲部提出了实质性的请求：让我们抛开推测臆想，到宝库中看个究竟吧。这个宝库便是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库。专家们企图从中得到过硬的资料。为此，亚洲部进行了长达十三周的辩论。辩论细节从未透露过，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库曾短期开放过。

这里要讲的，就是在档案库最关键部分发现了“白种华人”约翰·波利在北京供职二十二年间信件，并由此引出他的故事。

尽管约翰·波利的信件和他的生活与当时的历史事件紧密相关，但我们不是旨在解释历史上的疑点和记叙历史，所以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到他本人以及那些与他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人们身上。约翰·波利的那些高深莫测的信件，记述了他在东方渡过的时光，在零散与偶然中，也勾勒出了他的性格特色。

波利的信中有一些令人费解的段落和思绪表达模糊的地方，甚至经常出现无法翻译的古汉语词汇。但有两个女人始终是他信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信中表达了对她们的无限爱意，那就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同时，由于极度思乡而产生的懊丧情绪也时而在信中流露出来。当然，他也提到了中国人。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渡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波利认为自己从未真正地理解过中国人。

## 第 一 章

如果说某个具体事件可以做为我们的故事的开头，那就是发生在1971年7月30日，约翰·波利的19岁的女儿被劫持一案了。

当然，有人会说故事应该按时间顺序，也就是从22年前，波利初到上海时讲起。但从现存的材料中可以看出，玛姬·波利被劫持一案，确是兰利的史料编写者心目中，关于波利的故事里最突出的一环。

有人认为，约翰·波利的女儿被劫持是中央情报局亚洲事务部内部对抗力量之间的矛盾日趋白热化的结果。对抗的双方，一方是集中于香港、台湾并且活动了多年的所谓中国勇士；另一方面是设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情报局亚洲部头目。这一事件，不仅关系到一个19岁姑娘的命运，而且是关系到整个远东的局势的看法。

档案记载了这次劫持事件的始末：1971年6月初，在理查德·尼克松与毛泽东著名的北京会谈不久，约翰·波利开

始对自己和女儿在北京的安全表示担忧。他列举了他的间谍生涯中所经历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纠纷来说明这种担忧不是毫无缘由的。他在当时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北京存在着反对恢复邦交的力量，势力之强，甚至毛本人也对其束手无策。你需要我在此地留住更长的时间，我照办。但我的女儿必须在一周后转移到海滨去”。

这封信，以及在此之前的所有信件，都是发给波利的顶头上司西蒙·克兰的。

做为这个故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克兰此时已过不惑之年，早在二次大战前就干上了这一行，如今是中央情报局老牌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他的作用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十天后，波利把女儿送到了黄海边的一个避暑胜地。那儿景色幽雅，古意盎然。街道两旁的桉树环抱着一幢幢白色别墅。海湾边榕树参差成荫，岩岸遍布着清澈的深水塘。在档案中存有一张玛娅到此地后不久寄给父亲的照片，她站在岸边的草丘上，背景是一角绿色的船蓬，一行松林和一片透着斑驳阳光的竹林。

关于劫持事件本身，波利认为，他的女儿是在拂晓前被人从旅馆的房间里弄走的。有个门房曾上前阻拦，结果被对方用金属管痛打了一顿。劫持者没有留下索取赎金留言之类的东西，因此绑架的原因不得而知。

由于波利已在很大程度上卷入了当时北京领导阶层政治上的权利之争，人们立刻想到姑娘可能是被军队中的极左分子劫去的。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种猜测。波利肝肠寸断，悲痛已极，在寓所中整夜徘徊，不思茶饭。

劫持案发生三天后，档案材料的注意力从北京和黄海转

向了弗吉尼亚的兰利。在那里，西蒙·克兰提出了围绕姑娘失踪这件事的全部涵义所作的周密分析。他的分析是从一份不引人注目的报告开始的。那是一份英国在香港边境哨所提供的关于一个非法偷渡者从大陆潜入香港的报告。偷渡发生在九龙以远新界罗马山附近。

那里是一片阴郁荒凉的土地。山野中遍布着大片的沼泽，茂密的柳树遮蔽着水洼，山丘上杨树茂盛。英国哨兵报告说，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在黎明后乘船渡过深圳河，上岸后立即被三个身份不明的人接走。耐人寻味的是，偷渡者越境的地点正在共产党边防哨卡的视线之内，而他们竟毫无反应。报告附有询问兰利是否插手了这次偷渡的附件和克兰声明兰利与此无关的回电。

就此偷渡事件，克兰立即提交了两份备忘录，并在备忘录中表明他对中央情报局香港站及香港站站长杰伊·萨根怀有疑虑。事实上，杰伊·萨根早就引起了克兰的注意。这里有必要对杰伊·萨根和他的终生好友兼支持者，冯麟——一个中国国民党分子——的背景和作用做一简要介绍。

和西蒙·克兰一样，对杰伊·萨根等人的介绍也要远溯于1971年劫持案之前。他到亚洲的时间与约翰·波利几乎相同，当时被派到上海，听命于克兰。不久，他便成为被中国上层人物所能全盘接受的少数几个西方情报官员之一，并由此蜚声于情报界。

冯麟的卷入也始于上海，大约是在国民党倒台前两年的时候。做为蒋介石手下的一名反共要员。他与萨根密切合作，发展、训练特工人员，组织海防卫队。国民党战败后，冯便靠着自己在鸦片生意中聚敛的财富过着奢华的日子。这

时，萨根又找到了他，对他说，“我们可以重新合作，重操旧业。你出人，我出技术。”三年之内，他们在南至澳门、广州，北至武汉以及整个西南地区的范围内，拼凑起一支支特工队伍。20年中，这种队伍已遍布亚洲。每逢萨根需要向人解释他在东方的所做所为时，他总是说，他为东方输入了技术。

约翰·波利与他们的关系又如何呢？在共产党即将赢得全国胜利的那大动荡日子里，约翰与冯麒麟的弟弟冯麟之间发生了一场个人争端。结果，波利杀死了冯麟并逃往北京，而冯麟则发誓要报仇雪恨。

克兰对约翰·波利的女儿被劫案所作出的分析推断，就基于上述背景。在劫持案发生后，他立即向亚洲部高级官员诺曼·派尔提交了三份备忘录，每一份都指出不应排除萨根与冯同谋的可能性。

“我确信”，克兰写道，“冯麒麟策划了劫持行动，而且目前正控制着姑娘。我还认为S（指萨根）不是同谋至少也是个知情者。”

为论证自己的推断，克兰在备忘录中列举了三件杰伊·萨根与冯同谋对抗兰利政策的事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鸦片贩卖活动。

克兰的分析最初遭到怀疑，档案中的一份有关文件指出，多年来杰伊·萨根一直是美国情报界的一员得力干将，而冯麒麟也是一位同样可贵的委托人。何况，姑娘是在冯麒麟或萨根的势力都鞭长莫及的中国大陆境内遭到劫持的。这一事实使得克兰理论更加令人怀疑了。

然而，克兰坚持己见，毫不动摇。他在另一份备忘录中

争辩说，冯在东方有相当的势力，共产党的边界对他来说也并非障碍。“我们早已得知，冯与大陆某些共产党官员存在着合伙关系，”克兰写道，“因此，我的看法不是毫无根据的，可能性确实存在。”

对此，诺曼·派尔的答复是，“好吧，就算如此，你打算采取什么对策？”

于是，在最后一份备忘录中，克兰提出了进行秘密调查的必要性。首先，他认为，公开调查会打草惊蛇，致使冯赢得时间销毁一切寻找姑娘的线索。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不得采取任何可能暴露兰利与约翰·波利的关系的行动。对这一点，克兰进一步地解释说，除了克兰和派尔外，只有两个人掌握约翰·波利的情况，那就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国务卿。（总统将永远蒙在鼓里，以避免今后可能造成的尴尬局面。）

由于以上原因，也由于“波利在北京所起到的微妙的平衡作用”——用克兰的话说，一个本来与此案毫无关系的人被卷了进来，他的名字叫比利·卡西迪。

×        ×        ×

十二年前，二十三岁的卡西迪从中国监狱获释。当时报纸上对此进行了报导，并披露了他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另据消息说，卡西迪是在驾驶一架改装的B-17型飞机，在南京南部上空被中国防空部队击中迫降时被俘的。同时被俘的还有四名国民党飞行员。那一次从台湾起飞的飞行曾一度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空中侦察计划的组成部份，后来卡西迪承认，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向中国农民散撒政治敌对传单。

当时的许多报纸在报导此事时刊登了卡西迪的照片，那

是个相貌端正，目光柔和，蓄着金色头发的漂亮小伙子。他身着轻便的运动衫和便裤，左手提着一只帆布飞行袋，正从停落在夏威夷机场的一架军用运输机上走下来。他身后，有两个皮肤晒得黝黑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第三个人的影子映在扶梯的栏杆上。快门捉住了比利举步的一瞬间。他面带微笑，凝望着跑道尽头的一丛棕榈树。

除了这张照片和简短的报导外，年轻的卡西迪再没有被提起过，也没有人提到过他在北京的经历和他与约翰·波利、波利的女儿之间的交往。人们猜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他又回到了从前服务过的部门，过着与从前大致相同的生活。这种猜测大体上是正确的。他在圣地亚哥和母亲一起渡过了九天，又到兰利呆了一周等待重新分配，最后又被派回亚洲。似乎他的一切都没有改变，然而那只是他们外表和身份，可他的内心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北京监禁之前，比利·卡西迪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台湾情报站渡过的。台湾是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的中心站，有着三十七名兰利的工作人员和众多的雇员。当卡西迪获释后再次被派往东方时，他没有回台湾，而是去了香港。

香港站规模不及台湾站，然而在人们心目中威望甚高。由于地理位置关系，香港等于直接处在火线上。要管理大陆边境内的特务，行动必须迅速。那里平均每年有十二人被杀，遭绑架的则是这个数的两倍。因此，香港站的人往往抱成一团，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圈子。

在香港站工作的这一时期，卡西迪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恐怕要算杰伊·萨根了，他主管着整个港台地区情报工作，是卡西迪初涉秘密世界的顶头上司。早年他曾与卡西迪的父

亲共过事。(他对卡西迪说过，卡西迪的父亲是被红军所杀。而这纯属谎言)。

偶尔，在傍晚时分，卡西迪和萨根一起去海边的酒馆喝上几杯。坐在靠窗的桌前望着避风港内停泊的舢板，这时往往是萨根一人大发言论。他喜欢用“对抗力量”和“单边主义”一类的词，大概是以此显示他对亚洲问题的博深见解和作为东方世界的白色力量的代理人这一角色的自负吧。

卡西迪则默默不语，只是时而点头或嘟哝一句“懂了，先生。”沉默寡言是他的天性，他也懒得改变它。两人分手后，卡西迪总要独自在街上溜一溜。若是在北京监禁之前，这些街道会使他感到恐惧。而如今情况不同了。

另一个对卡西迪有影响的人是乔尼·雷，一个和他年龄相当的年轻人。其实，卡西迪早在被俘前就认识了雷，但成为朋友却是后来的事。卡西迪与雷的交往形式在很多方面与他和萨根的交往相似，比如，一块在酒馆喝酒，一个在讲，一个在听，等等。雷总是在忙碌不停，搞各种各样的名堂。今天去讹诈一个上海贸易委员会代表团的代表；明天又去想方设法往某使馆安插钉子。

卡西迪到亚洲不久就了解到了与谍报活动毫不相干的鸦片交易，但这是必要的。他很快也熟悉了贸易路线：从泰国和老挝的东西部开始，斜穿过孟加拉国进入西贡、吉隆坡、金边、最后到达香港。起初，鸦片对于卡西迪来说，不过是个抽象概念，正如杰伊·萨根的“对抗力量”一样。

吸毒者生活在自己独特的迷惘世界里，与火柴、锡箔纸和五彩纸相伴。尽管这种生意在现在已极为普遍，不再令人感到陌生，但在当时，卡西迪每月来上一次或两次三次，把

几百美元交到雷的手里，一周后，钱就会成倍甚至成三倍地回到他手中，这可算是很不简单的事情。至于货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卡西迪并不在乎也不打听，甚至不在乎自己从中赚了多少钱。他到香港不久就这么干上了。他觉得这就象玩马票或是往储蓄罐里放硬币一样平常。这也是他的一个变化。在被俘之后，结识约翰·波利之前，他在钱财问题是相当认真的。可现在，钱却变成了抽象的概念。

他只是偶尔在星期日下午和雷，或别的什么人在一起随便吸一点鸦片。可以说他个人与鸦片缘份不深。可事实上，正是鸦片使得他和他生活中第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冯麒麟，真正杀害他父亲的人有了接触。卡西迪对冯了解不多，但他和香港中所有的人一样，能够感觉到此人的存在和力量。香港站保存的档案中有些关于冯早年在上海活动的备忘录，还有几份警方的报告，提到了冯与一个臭名昭著称为“三合一”的犯罪社会的关系。至于冯与杰伊·萨根的关系，卡西迪只能凭查觉和猜测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同一个机构使得杰伊·萨根成为亚洲情报事务的主宰，而使得冯成为鸦片贸易的主宰。

总的说来，卡西迪生活在这个圈子之外。他并不介意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只要人家不来打搅他，他就心满意足了。

在我这个故事开始时，比利·卡西迪是这样生活的。从北京回来至今已经一年多了，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变化。他对波利记忆犹新，对波利那聪明伶俐的女儿更是怀念不忘。有一两次，他同人谈起过波利，但从未提到过那个姑娘，因为那太使他伤心了。